

删人快语



「法」安妮·埃尔诺著 郭玉梅译  
《一个女人的故事》  
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女儿生下母亲

□ 蒯乐昊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安妮·埃尔诺，“新自传文学的女王”（语出《时代》周刊），以诚实、直面日常的写作著称，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对她的褒奖是“以勇气和临床医生般的敏锐，揭示出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约束”。《一个女人的故事》和《一个男人的位置》便是她作品中堪称对偶的两部，分别对应着她的母亲和她的父亲。

对于女性写作者来说，书写自己的母亲是一个天然的“母题”——字面意义和引申意义同在。母女关系，无论这种关系是亲昵的还是疏离的，是映射的还是对抗的，都是女性在亲密关系里的第一课。

安妮·埃尔诺从母亲之死开始着手写《一个女人的故事》，开篇第一句便是“我母亲死了”，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同属法国文学的另一部经典《局外人》，同样劈头盖脸就是母亲的死讯，同样发生在养老院中。

丧母之痛令人难以消化，唯一的办法是坐下来书写她：那个出生在诺曼底小镇，一生都在为生存挣扎，最后罹患阿兹海默，死在巴黎郊区医院老年病房里的女人。母亲出身寒微，对于她们那一代来说，能进工厂做女工已经是命运的上佳之选，但母亲不满足于她，她执意要开一家自己的食品店，自己做主话事。她实现了这一愿望，虽然小店也不过是惨淡经营。母亲总努力打扮自己，穿艳丽的衣裙，让自己看起来更加体面，她渴望学习社交礼仪，教育女儿要武装自己的头脑，因为知识才是最美的。书籍在这个家庭是高尚珍稀之物，母亲总要先洗手去拿书，甚至日常也尽量说标准法语，避免谈吐中出现方言土语和语法错误，也会学着那些“有身份的人”说过的词句……这种超越阶层向上攀升的渴望，与其说是一种野心，不如说是一种不甘局限的生命能量。

为了让自己的女儿能摆脱卑微的社会阶层和恶劣的生存环境，父母不分昼夜地工作。女儿很争气，一路成绩优异，去鲁昂读高中，去伦敦读大学，成为知识阶层，嫁入了好人家，但当女儿上升到了所谓的高层时，她与父母却产生了无法调和的隔阂。阶层流动，在上一辈这里，是一代又一代人培养自己的叛军。他们几乎是带着悲凉的欣慰，看见女儿融入了新的世界，把他们甩在身后。“她每天从早到晚卖土豆和牛奶，就是为了让我在阶梯教室里听老师讲柏拉图。”而在下一辈那里，则是内心的流亡，失去了亲人之间心心相印的理解与沟通。“她经常对我发火：‘你上的可是寄宿学校，你可并不比其他人好多少。’在某些时刻，她把在她面前的女儿看作是一名阶级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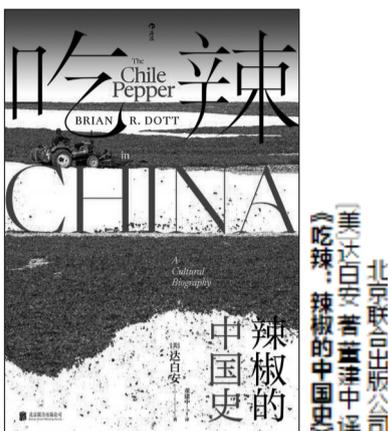
甚至在女儿出嫁之后，那种不安依然困扰着母亲，一方面，她骄傲女儿的婆家都是有修养的高雅渊博之士，为女儿能够成为其中一员而感到自豪，但同时她又担心，那种彬彬有礼里面隐藏着对她的鄙视。深刻的“不配得感”，导致母亲总是提醒女儿：好好经营你的婚姻，别让婆家把你休了。

作为新生的知识阶层女性，安妮·埃尔诺意识到，她需要反抗的东西很多，她反抗社会习俗、鄙视宗教活动，也忽视金钱，但这种愤世嫉俗的反抗，本质依然是浪漫的，像不被理解的艺术家的特权——她的父母就根本不具备这种反抗的奢侈，因为他们来说，反抗只有一种意义，就是摆脱贫穷，反抗也只有两种方式，那就是拼命地劳动赚钱。

父亲过世之后，母亲卖掉了食品店，搬去跟女儿女婿一起生活，她终于跨入了那个她向往的高雅阶层，为了得到爱，她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女仆，她做家务，照顾孙辈，采购，打扫房屋，不停地找活干。但同时她也发现自己格格不入：不能在门口的暖气片上晾抹布，对唱片和水晶花瓶需要小心翼翼，严禁用自己的手帕给孙儿擦鼻涕……母亲终于生气了，她叫道：我在这里生活得一点都不舒服！

没有什么深文大意，有的只是琐碎日常里流动着的、难言的芒刺，深刻的抱歉，无解的遗憾。埃尔诺说，她写的既不是传记，也不是小说，而是一种介于文学、社会学和个人史之间的东西，她按母亲的愿望，进入了那个掌握语言和思想的世界，她就有义务写下母亲的故事。

“现在我书写我的母亲，就像该轮到她重新让母亲出生”。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吃辣：辣椒的中国史》  
王彦彦译

一场别开生面的归化

□ 陆远

对于像我这样嗜辣如命的读者来说，看到架上赫然出现一本名字就叫“吃辣”的作品，大概绝不想错过。但是要小心，说不定您会因此漫不经心地掉进两重“陷阱”：如果以为它是一本“寻辣指南”“风味手册”之类的美食读物，那么恐怕您要大失所望，因为书中的内容很难直接刺激老饕们敏感的味蕾；可一旦因此就悻悻然放弃继续阅读的兴趣，那或许意味着更大的遗憾——与一个别开生面的文化历险故事失之交臂。作者达白安告诉我们，辣椒在中国旅行历程的精彩程度，一点不比它本身带来的味觉感受逊色：既强烈刺激又令人愉快，更加回味无穷。

所谓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中国自古讲究“五味”，可延至今日，以味觉风靡程度和文化多元性质两方面而论，大概要以“甜(甘)”和“辣(辛)”最为显著——如果说遍布街头的糕饼屋和奶茶店显示了“甜味”强大魅力，那么我们同样难以想象，今天的中国菜如果缺少了“辣味”会怎样。可许多人并不知道，在明朝中期以前，中国根本就没有辣椒。今天我们在中国田间、菜场和餐厅里见到的所有辣椒，都源自它们远在中南美洲的老家(这个庞大茄科家族的远近亲属，至少还包括土豆、番茄、烟草等)。大约16世纪中期，辣椒进入中国，从那以后，辣椒在这个有着悠远饮食文化传统国度的旅程，可谓历经曲折，然而最终它不仅完全适应了异域环境而成为土生土长的植物，其被接纳和受欢迎的程度还远远超过了本土的花椒——在超过1500年的时间里，花椒一直是五味中“辛”的主要代表，然而外来的辣椒只用了不到300年的时间，就彻底取代了前者的地位。

达白安翻阅大量古代文献，尤其是内容丰富而驳杂的方志材料，考证了辣椒进入中国的大致时间和路径(在这一点上他展示了一个经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的严谨与细致)。与花生、玉米、土豆、甘薯、烟草等一样，辣椒与中国的邂逅也是大航海时代全球贸易与文化交流的产物，但与其他外来农作物不同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辣椒是受到广泛排斥的——它既不像花生、玉米、甘薯、土豆那样拥有富含热量的甘美果实，又不像烟草那样可以提神醒脑而具备经济价值，辣椒本身过分刺激的味觉感受又与儒家士大夫讲求冲淡平和的饮馔传统格格不入。因此，上流社会会对这个奇怪的舶来品，要么不屑一顾，要么敬而远之。达白安从明清文化史中勾陈出几个有趣的例子，形象说明这种心态：《红楼梦》用辣椒来比喻最有性格特点的王熙凤，然而大观园的餐桌上却从未出现过一道和辣椒有关的菜肴；江南士绅家庭也许种几株辣椒作为奇花异草，几百年来的人文墨客却几乎不会为辣椒做一句诗，画一幅画。

然而，对于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底层民众来说，由海外几经辗转传入的辣椒却成为贫寒生活中难得的恩物。辣椒生命力旺盛，在几乎所有地区都可以种植，因此价格低廉；通过干燥或腌制，辣椒又能够长期保存。对于穷苦人来说，辣椒既能刺激食欲，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价格昂贵的食盐，又多少具有驱寒除湿活血抗菌的功效，更何况鲜红的色彩本身也可称得上“秀色可餐”。由此也形成中国“传统食辣区域”：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江西以及陕西西南部。到19世纪中后期，辣椒这个文化的闯入者终于凭借自己的实力，在中国全境自下而上地实现本土化，不仅进入上流社会文人雅士的菜单，更成为许多中国人每餐不离的伙伴。

不仅如此，辣椒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还远远超出烹饪领域。达白安通过对几部中国文学作品的解读，揭示了辣椒是如何进一步融入中国本土意象世界，从而改变中国本土文化实践的。汤显祖的《牡丹亭》是最早记录辣椒的古典文学作品，在全剧关键的第二十三折《冥判》中，作者借39种花名比喻一个女人一生中要经历的种种阶段：青春期、恋爱、定亲、圆房、蜜月、生育子女、美人迟暮，而“辣椒花”，被用来隐喻圆房这个阶段，标志着将辣椒与女性身体欲望联系起来的女性形象的开端。进入20世纪，辣椒被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涵：豪迈的革命气概，泼辣奔放的性格，兴旺红火的生活……在某些地区，辣椒成为地域身份认同建构的主要符号——革命年代湖南人常自称，他们一辈子只做三件事：吃辣、读书、打天下。

我曾在《具体而微的文明历程》中，以历史学家王晴佳的《筷子》为例，说明一种毫不起眼的日常用品如何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人文历史的变迁。辣椒在中国走过400年别开生面的“归化”历程，也说明任何一种有活力的文化，一定是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

远见近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琴峰著 炸伊译  
《出生意愿确认》

生育与同意

□ 张怡微

几年前，我在教“现代台港文学史”的课上，遇到了一位韩国留学生。在她的课程报告中，我第一次听说中日双语作家李琴峰，当时我们将她纳入到白先勇《孽子》、邱妙津《鳄鱼手记》的脉络中，作为这一流派新生代的延续。2021年，日本文坛著名的“芥川龙之介赏”颁给了1989年出生的李琴峰。当时我以为她是出生在日本移民家庭的写作者，后来才知道，李琴峰是15岁自学日语后旅居日本，以第二语言写作并获得肯定。放眼现代文学史的话，不知她是不是继龙瑛宗等更为古老时代的双语写作者获得日本主流文坛肯定的外国人。读《出生意愿确认》这本书时，读者难免抱有很高的期望。虽然历经了翻译损失，我依然会有一些神秘的幻想，希望李琴峰创造的世界是新颖的、别致的、我们没有见过的。实际的阅读感受很复杂。

简单来说，《出生意愿确认》是一个女性科幻故事。写的是50年后，当人类生育领域科技树到达顶峰时，胎儿在怀孕期的两周前可以根据生活难度评估自己决定“是否分娩”。最终是“出生”还是“退出”，父母都要接受孩子的意愿。如果违背胎儿的意愿执意生产，父母就会被视为罪犯而被社会排斥。这个“出生意愿确认”的法规成为美丽新世界的进步公约，不过这个罪名属于亲告罪，也就是说，父母违反胎儿意愿强行生育下来的孩子，长大后可以选择控告亲生父母，也可以选择告不告。如果不告，那父母则可以免于刑责。从写作技巧来说，《出生意愿确认》开篇的设定已将限制拉满。小说里主要的女主人公大都有跨国背景的家庭或同性多元成家的意图。她们出场时，就带有了“未来感”，但这“未来感”却不是以更便利、更轻盈的身体感知降落到女性“命运”之上的，这种“未来感”的外观之下包裹着非常朴实的、一厢情愿的、悲壮的母职自觉。

小说似乎在提醒我们，当科技不再是问题时，“生育”问题就会直面伦理。于是，新的“法规”作为极端的限制浮上水面，它看似更关注个体的意愿，它讨论的是回应海德格尔对存在“被抛掷性”的哲学阐释。我们不能改变的那个事实，即“被抛掷”确实影响着个人的存在。种族、性别、阶级、财富的差异难以消除，但我们却不能选择自己是否出生、何时出生、如何出生。这是人体验其“命运”的地方。李琴峰试图冲击“存在”的“被抛掷性”，这是挺有意思的想法，但还远达不到革命的地步。它只是一个虚拟的问题意识：如果我们在出生前可以预判未来生活的难度，我们是否还会选择来到人间。

如果李琴峰能将胎儿预判命运难易程度的标准合理化，也许《出生意愿确认》的文学性会再上一个台阶。人的复杂性就在于多变、柔韧、难以预判，作为未经受训的婴儿个体，又该如何理性地建构起“出生意愿”呢？小说刻意绕开了“堕胎问题”的意识形态泥沼。实际上书中所谓的“同意”制度，就是“强制堕胎”的变体。小说里谈到了不少意见，都围绕着“制度难免不合理”这样轻盈的理由，其实是把一个好问题简化了。换句话说，经过特定的机构检定，胎儿拒绝出生，那么依照小说里的法律，孕妇就要进行“取消出生手术”，此时已是怀孕前两周，这不就是高危的堕胎吗？我们假设科技已经达到不需要担心引产的危险性，但谁又能保证术前检查的公正以及所谓“出生意愿”在生命伦理上的有效性呢？

于是小说继续往前推进，写到了愤怒的孕妇慢慢形成了自己的反抗团体，这个反抗团体甚至带有一些暴力特征，试图对检测的医院进行复仇。因为胎儿拒绝出生，亦会影响到夫妻的婚姻生活，伴侣之间因此最后分道扬镳的不在少数。在我看来，这样的同意制度真正会冲击到的主流层面恰恰不是异性恋夫妇，而是非婚生育或同性生育或代孕等游走在现实法律灰色地带的小生命。当然从小说构思的角度来说，最愤怒的可能也确实是对生育准备良好的家庭。但我更想看到的，是那些明摆着出生即倒霉的小生命，不需要经过太多复杂的评估体系就能基本预判的消极命运中诞生的个体，他们将如何冲破常态的阻碍，最后完成自我实现，由此，再将“出生意愿确认”与海德格尔的“被抛掷性”建立起文学虚构意义上的决斗。而目前李琴峰提交的方案，则更像是一个话题日剧的纲要。我好像在哪部鼓励生育或讨论生育的日本电视剧中，看到过类似的小讨论、小冲突和歧出的反抗团体所做出的失败的举动。

正如这本小书封面上的宣传语所暗示的，比起“你们生下我时，经过我同意了吗”的大字，我更期待看到的是上面的小字：“当‘出生意愿’需经本人‘确认’，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了吗？”

微言达义